

老友袁良骏先生当年在《中华读书报》等学术领域纵横驰骋,骁勇善战,左冲右突,见招拆招,引人注目,可这位英名振荡同时“恶”名远扬的人,身后是如此空荡、寂寞。

袁良骏走上鲁迅研究之路,系受其老师王瑶的影响。著作等身的袁良骏,最为人们认可的是鲁迅研究者。此外,他还是一位有影响的台湾文学研究家。

袁良骏是一位耿直的人,他不愿接受来路不明的“资助”。记得上世纪末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期间,他和在中文大学读研究生的陈强(笔名江弱水)在金庸秘书的安排下,访问了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临别时,金大侠给两人分别送了他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英文精装版,后来袁良骏在宿舍翻书时,发现内有一个大信封,装有一千元港币五张,他连忙打电话给金秘书,说我不是“寒士”,不需要“救济”,另“无功不受禄”,我从未写过研究这位大师的文章,表示要退款,后来金秘书解释说:“金庸未派车接你,又未请你们吃饭,这是误餐费和车费,不成敬意,请笑纳。”钱未退成,袁良骏后来一鼓作气写了一系列批评金庸的文章,有人猜他是嫌钱给少了,其实非也。因在当时对内地教授来说,五千元港币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袁良骏那时的工资大概只有几百元人民币。他批评金庸,是因为他认为这位作家所写的小说无非是拉帮结派,打打杀杀,恩恩怨怨,血染江湖。中国武侠小说那种陈旧、落后的小说模式本身,极大地限制了金庸文学才能的发挥,使他的小说仍然无法全部摆脱旧武侠小说,仍然无法不留下许多粗俗、低劣的败笔,够不上“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之美誉。

“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之美誉,系出自以治学严谨著称、外号为“严加严”的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严家炎。正是这位严家炎,导致曾是“白话小说”主要兴起地的北京大学,成为此次金庸小说研究的“重镇”。严家炎认为:金庸小说实际上是高雅文化改造通俗文学获得了空前成功,金庸以他的学养、功力和才华从本质上升了他的武侠小说的境界。在1994年10月25日查良鏞(金庸)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上,他致的

“贺辞”中有云:“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同年,受此殊荣的金庸把这篇“贺辞”拿到自己创办的香港《明报月刊》12月号上发表。不料这一年12月,有人在报纸上发表了火力颇猛的《拒绝金庸》,刻意嘲讽和谴责了这篇“贺辞”,认为其文的要害是“说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是‘北大自贬身份而媚俗’。”人们当然可以拒绝金庸,还可以拒绝吃饭,但袁良骏不这样看。他读后喜出外望,感到“拒绝金庸”的观点正中下怀。

据说严家炎是袁良骏50年代上北大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但袁良骏不承认。有人考证说,严家炎的确没有正式给袁良骏上过课,当时教现代文学史的是王瑶,严家炎只是课后的辅导员。不管是老师还是辅导员,袁良骏均本着古人所言“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和严家炎展开笔战。他在写了《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铸剑》一哭)《学术不是诡辩术——致严家炎先生的公开信》,对严氏“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种观点鲜明地表示不认同,另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有《〈铸剑〉、〈断魂枪〉都是武侠小说吗?——向严家炎先生请教》,同样毫不吝惜他的批判锋芒。严家炎“寸土必争”,决不相让,连续发表了《为〈铸剑〉一辩》《就〈铸剑〉与金庸小说再答袁良骏先生》《批评可以编造和说谎吗?——对袁良骏先生公开信的答复》。袁良文的长处在于棱角分明,笔锋犀利,但写得过于粗放,如他在谈金庸小说有六大痼疾的文章中说:金庸小说总体构思的意念化、模式化、公式化,举例是《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先设下东邪、西毒、南皇、北丐、中神通五大派系,再衍生他们的恩怨情仇。五大派系的矛盾不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而出于作家自己的杜撰。这一杜撰和那些武侠小说如出一辙,未见高明。”其实,在中国白话小说史里,金庸塑造了众多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有的还成为“共名”,其文学典型之多是



袁良骏

不戴面具的袁良骏

■古远清

有目共睹的。此外,袁良骏对金庸小说没细读,他说的“南皇”应为南帝,可见袁良骏不掌握事实,也不据实分析,而且不宽容,甚至出奇地固执。他做金庸研究居然不太关心批评的文本,连如此重要人物与情节的引用都有差错,如对《射雕》三部曲的故事大纲,他就没有列对。金庸的确是写了五个奇人,即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但还谈不上是什么“派系”。即使可称“派系”,袁氏以“五大派系”论说,也是以偏概全。他2002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武侠小说指掌图》,更是谬误百出,《文学报》曾发了一整版文章帮其纠错。

这场被称为“严、袁之争”的论战,从北京打到上海,又从上海打到香港。如此一来一往,火药味逐渐浓了起来,特别是袁良骏在香港《香江文坛》发

表的文章,调子甚高,差点酿成诉讼事件。严家炎在2003年青岛召开的王蒙国际研讨会期间,也曾向我搜集过袁良骏攻击他的证据,即袁良骏有无在背后说他接受过金庸“好处费”的文本,严氏一再声明自己著书立说决不是为了“润稿费”,他的“贺辞”在金庸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所得稿费十分微薄,但从不放在心上。即使有美国某高校以高薪请他去讲学,他也没有动心。严家炎是我尊敬的学者,他一生问学,视学术为生命,将研究著作名山事业,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具有学术风骨的大家,他说的话我完全相信。1993年,我和严家炎、谢冕一起在岭南学院(今岭南大学)“客座”,对此我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不过,我这里倒要“批评”一下我尊敬的严先生,他研究香港文学——准确说法是研究香

港通俗文学,太不了解香港文坛的“行情”:香港雅俗文学对峙严重,像刘以鬯主编的以雅文学著称的《香港文学》月刊,从不开登通俗文学作品和研究文章。可在1993年8月2日,由《香港文学》主办的香港作家刘以鬯、陶然、汉闻、王一桃与内地学者严家炎、谢冕、李元洛、徐志啸、古远清等人出席的文学交流的会上,严家炎面交自己写的一篇论金庸的学术论文给刘以鬯,刘氏看都不看立刻就掷还给他。至于严家炎问我袁良骏有无讲过他的坏话,我答复说:“你和冯其庸等人编写的金庸小说赏析,被金大侠说成是小学生水平。袁良骏说你受辱后照写‘吹捧’金庸的文章。其中原因,不得其解,这很可能是‘千古之谜’。其他的话他并没有说呀。”我劝严氏不要打官司。袁良骏得知后,致感谢信说:

远清兄:

严大教授亦扬言要告我,弟正拭目以待。敝院李某也告了我一小状,庭外和解了。兄在我与严之论争中,持论中立,甚为“狡猾”——并非忠厚也——但仍仍对我有利,值得感谢……弟袁良骏上 2004年元旦

西哲有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袁良骏本着这种精神嗜好争辩,常常在“抓生产”的同时为“巩固国防”,与一些作家、学者产生碰撞。他最早的一篇是《要客观地评价曹操——向郭沫若先生请教》,发表于《光明日报·史学专刊》1959年3月5日。他后来写了《“两个翅膀”献疑——致范伯群先生的公开信》,挑战通俗文学研究泰斗。另有《袁良骏声明:黄锦奎从来不是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在《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期上发表。他另一篇《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引来商讨文章。袁氏的《鲁迅与现代文化名人评价问题》,有人写了《是鲁迅错了吗?》与他争鸣。袁良骏将有争论的文章结果为《袁良骏学术论争集》出版。可这本《论争集》又成了新一轮论争的导火线,如有人写了批评这本书的文章《我们需要怎样的学术论争?——评〈袁良骏学术论争集〉》。我没有见到这本书,但

效仿过袁氏在台湾出了一本《古远清文艺争鸣集》。

我迈进古稀之年时,曾将海内外包括胡秋原、臧克家、余光中等名家给我的书简辑编为《古远清所藏收信选》(未出版),其中收了袁氏的数封信,可有不少字难于辨认,并请他一一校正。他完全同意将他的书信收入其中,并嘱咐出版后送他一本。

有道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在袁良骏生命进入严寒时刻,我竟阴错阳差成了他的“劲敌”。事情系由袁氏在香港一家杂志2007年6月号上发表杂文所引发。他攻击受人拥戴的曾敏之,当“中国世界华文学会”名誉会长、“香港作家联合会”创会会长等三个文艺团体的会长(其实是“被会长”),是有“会长瘾”,“正如打麻将上瘾、吸毒上瘾、嫖娼上瘾一样”。这篇短文《华文文学》杂志2007年第5期增加转载,并配上“申文”长篇的质询文章《何必如此作贱自己——质疑袁良骏教授》。我对袁氏批评曾敏之一事,总感到像吃了一只苍蝇想吐,便在2015年在台湾出版的《耕耘在华文文学田野》收入这篇短文时,末尾附记曰:

一位著名北京学者自动对号入座,写了一篇据说让我血压升高很可能含有人身攻击的回文文章,《上海鲁迅研究》说该文不宜发表,但可给我参考……《上海鲁迅研究》责编后又说:“天气太热,袁先生的信不转给你了,以免徒增火气,不利健康。昨致电袁先生,他还在激愤之中。”这使我失去了阅读这种奇文的机会,甚憾。

2015年秋季,袁良骏生了一场大病,从鬼门关走了出来,他这时反思自己生前所写的文章,大概认为最不妥、最受人诟病的是《曾敏之先生的“会长的瘾”》,因而在《上海鲁迅研究》2015年冬季号发表了《我和曾敏之先生的学术交往》,主动进行自责。常常以自己为是,以别人为非,一向无惑又无悔的袁良骏,激烈得快,平和得也快,真出乎我意料之外。须知,他是从不服输的人。这次他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威迫下知错必改,其勇气令人钦佩。

戴望舒在上海的最后岁月

■陈 虹

戴望舒,中国新诗标志性人物,上世纪20年代末,其代表作《雨巷》名满天下。斯人才华横溢,因诗句中常含有淡淡忧伤、隐隐悲怨,故有悲情诗人之谓。惜乎,其命运多舛且英年早逝。然而,对文化人而言,他和他的诗却从未“在遗忘里沉埋”。

纵观戴望舒45年短暂人生,多个重要时段生活于上海,总计逾14年。本文所追寻物沉的,是其最后一段,即居住在虹口其美路(今四平路)新陆村的两年。

为自辩和团圆而来

淞沪战役后,上海被日寇占领,1938年5月,戴望舒携家人远赴当时尚未陷落的香港,滞留香港近八载。光复后,人们欢欣鼓舞,本该由戴望舒出面主持香港清查附逆文人的工作,孰料,有一披文人联名致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状告其在香港沦陷时期有“附逆”行为,21个署名者中,有的做贼心虚,生怕戴望舒查到己头上,于是喊喊捉贼,祭出栽赃诬陷撒手锏,有些则属受蒙蔽附庸。幸好,文协总会收悉该信后,并未草率下结论,让戴望舒到已由重庆搬迁至上海的文协总会作自辩,厘清真相。戴望舒得到指示后立即动身,前往阔别多年的上海。

1946年3月7日,戴望舒到香港《新生日报》编辑室了结束,随即携妻子和两个女儿乘船离港。此番行程匆匆,原本并未作长期居沪打算,故只带了简单

行李,许多东西仍放在香港,八后,先暂居姐姐戴瑛处,旋迁居孙大雨邻近城隍庙的方浜中路祖宅。他找到文协总部领导,递交了披肝沥胆写就的《自辩书》,道尽身处黑暗备受煎熬之文化人的磨难与冤屈,尽管算不上英雄般慷慨陈词,但其表达的深沉和悲切,足以获得文协领导的重视和同情,尤其是夏衍等人向来对戴望舒怀有敬重和怜悯之心,纷争遂渐平息。

不久,由好朋友、著名翻译家周煦良介绍,戴望舒受聘新陆村师范专科学校担任中文系教授,同时在暨南大学兼任西班牙语教师,收入始有来源,家庭生活亦安顿下来。戴望舒之所以卜居新陆村,盖因为新陆师范可提供甚好的住宿条件,每位教授租用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二居室独立、带小花园的房子,如此优厚的待遇自然吸引了包括戴望舒在内的众多教授。他还按原先与穆丽娟(第二任妻子,穆时英之妹)的离婚协议条款,将长女戴咏素从寄宿学校接回家。戴咏素回忆道:

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抗日战争胜利,他们遣下它走了。房子较新,干净。内部是日式的,浴缸是木质的,地上铺的是榻榻米,除了大门和客厅外,其他的门是纸拉门,二楼有壁柜。我们搬进去时什么也没有带,因为什么也没有,除了沙发茶几,写字台在一楼外,还有一个似五斗柜的柜子二楼,我们夏天就在这环境中生活。不过父亲的兴致

很高,白天在楼下看书,接待朋友,没事就到隔壁的孙大雨家中聊天,到对门的周煦良家中聊天,还常和朋友在小区前的空地打上打网球,领着包括奶奶在内的家六口在后面的空地上种东西,杨阿姨打着赤脚也跟我一起干,我们三个在地里窜来窜去地捣捣乱。父亲不是农民,却喜欢种地……是什么吸引了他?是恬静的田园生活?天气渐渐凉了,父亲买回了几张床,我和奶奶住在一楼客厅的后面一间,父亲他们住在二楼。这时他的宝贝,八箱书也从香港运来了。他把一箱箱的书打开,上上下下地翻看,满脸满足的微笑,他买来了许多书柜,把客厅的一面墙全占去了,书柜里放满了线装书,四部丛刊就放在那里。有书,有朋友,有安定的生活,这是我父亲最向往的,我常常听到他用英文唱“老黑奴”,还有法文歌。

此寓所,乃新陆村11号。在女儿和母亲眼中,戴望舒的归来是为了难得的举家团圆。

在困顿中徘徊砥砺

安家在新陆村的戴望舒,尽管享受着起居便利、环境幽静、阖家团聚之乐,尽管与好友孙大雨、周煦良成了朝夕相处、时可言谈的邻居,但困顿亦如影随形。首先,因他在香港时曾被日人抓捕关押刑刑迫害,出狱后又无暇好好调养,故身体大不如前,尤其是患有严重的哮喘。其次,家庭生活也面临危机。尚在香时,他与妻子杨静就出现了

感情裂痕,那阵子,戴望舒因友友,受到诬陷忙于自救,而杨静却因遭遇无法相援,也未给予充分的理解,反而热衷于参加美国兵营组织的舞会、乘小汽车在街头兜风,为此二人龃龉不断。到上海后,杨静依然我行我素,不仅经常参加舞会,跟熟悉的异性跳舞,甚至还结交一些不固定的舞伴,这使敏感多疑的戴望舒极为沮丧愤懑。

再者,戴望舒将大朵朵(咏素)接回家居住后,与前妻穆丽娟也时常往来,有时是他带着咏素去看穆丽娟,有时是穆丽娟来看望戴望舒和女儿。穆丽娟夫妻两相比较,便感叹“新人不如故”,这当然也让杨静醋意大发。杨静外形姣好,但并非“喜怒不动声色”之人,往往会当着穆丽娟或其他朋友的面责怪戴望舒,使他备觉难堪,于是,二人龃龉渐大,矛盾愈深。最终,戴望舒和杨静的姻缘走到尽头,在搬离新陆村半年多后的1949年2月21日宣告离婚。

困顿和困顿中的戴望舒,一方面奔波于几所大学从事教学,另一方面依然对文学创作保持高昂热情。1948年2月,戴望舒因患气管炎,病势转剧,在新陆村寓所卧床半月。同月,其第4本诗集,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本诗集《灾难的岁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收入他从1932年底到法国游学至1947年底写作的25首诗作,印了1000册。这本诗集的出版,

深得朋友曹辛之帮忙。戴望舒与曹辛之、王辛笛、陈敬容等九叶派诗人过从甚密,惺惺相惜。

遭通缉不得已再别

彼时的新陆村看似宁静、平和,可整个中国的时局变幻却波诡云谲,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呼声尚未沉寂,内战的阴影已然笼罩。尽管戴望舒是一位浪漫的诗人,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但他骨子里深植渴望自由的信念和不畏强权的意志,故而对当局所采取的政策和社会现状不无失望。他对杜宣说:“国民党来贪污腐败,恶性通货膨胀,又悍然发动内战。日本帝国主义刚刚打到了,美帝国主义又来了。美军在国内横行霸道,我们祖国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放,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点温饱的生活。”

1947年春,戴望舒应几位热心的文艺青年邀约,相聚在“香雪海”茶馆,即席作诗《无题》:

我和世界之间是墙,
墙和我之间是灯,
灯和我之间是书,
书和我之间是隔膜!

这是诗人当时心境的真实表白,诗作色彩阴郁,词语富有象征意象,揭示出其内心深处,苦闷,反映那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对和平的渴望。

戴望舒不光用诗作、文学作品排遣个人忧虑,还毅然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争取民主的时代洪流,参加“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他们举办双周聚餐会,以发宣言、作演讲、批评时政的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

1947年7月,戴望舒因为支持暨南大学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遭学校当局解聘;8月,他兼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教唐诗和中国古代小说史,同时兼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教音乐学。1948年5月,戴望舒因参加教授罢课,上海师专校长以他与共产党有来往为由向当局告发,因而遭地方法院出票传讯和通缉,不得已,只得再度携家眷避难香港。

戴咏素在父亲去世半个多月后追述道:

胜利之后的日子并不是大家所盼的大平日子。国民政府专制腐败,民不聊生。学生走上街头,父亲也参加到了学生运动中,在他留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常有学生到家里来,他还帮学生排期请愿书。不久父亲消失了,听大人讲他住到了施伯伯家,再后来说他去了香港。几个月后,杨阿姨和两个小妹也走了,剩下我和奶奶和书。热热闹闹的一个家就这样人去楼空了。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穿深色制服的男人,问奶奶:戴望舒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国民党军的军统特务。上海的房子紧张,我们家大人又都走了,剩下一老一小,于是不断有人来催我们搬走,后来有人硬是搬进来与我们同住。

就此,“雨巷诗人”留给新陆村的,只剩远逝的背影和空空的沉湮。